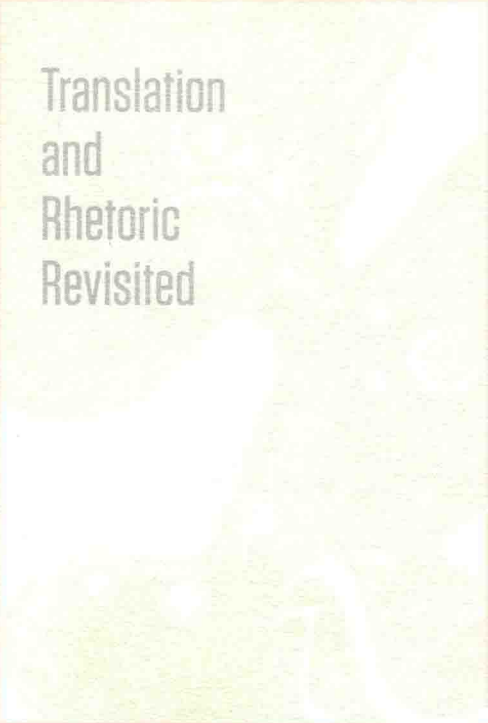


Translation and Rhetoric Revisited

翻译与修辞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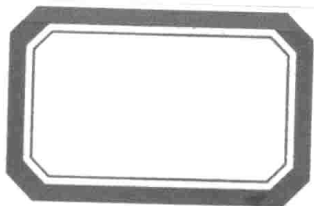
陈小慰 著



Translation
and
Rhetoric
Revisited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ranslation and Rhetoric Revisited

翻译与修辞新论

陈小慰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修辞新论 / 陈小慰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35-2971-6

I. ①翻… II. ①陈…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6269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李婉婧
封面设计	覃一彪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传奇佳彩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2971-6
定 价	36.90元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29710001

序 一

谢天振

获悉陈小慰教授基于其博士学位论文《翻译研究的“新修辞”视角》深化扩展的学术专著《翻译与修辞新论》即将正式出版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高兴。作为这篇论文的通讯评阅人以及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对这篇论文的写作规范、学术创新也许有比旁人更为深刻的了解，因此，当小慰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为她即将出版的这部学术专著写一篇序言时，我没太多推辞也就欣然答应了。

由于我自己多年来也一直在指导博士生的论文写作，所以慢慢形成了对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一种比较严格甚至有点苛刻的要求：我总是要求我的博士生要尽可能详尽、全面地收集、占有与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所有材料，要求博士生对所研究的课题要有一个问题意识，并且要交代该问题的由来。所谓“问题的由来”，其背后实际上是我要求博士生的研究能有一种“现实关怀”，意思是所研究的问题要与我们的社会现实、与我们的学术界的研究现实有密切的联系，所研究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于“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拍脑袋假想出一个问题，然后通过一番自说自话的演绎，便完成了所谓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此同时，我还要求博士生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时要有一种理论意识，即能够通过对其一种理论的驾驭和运用，发现其他人发现不了、解释不了的现象和问题。让我不无惊喜的是，小慰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我对我博士生的要求可谓不谋而合。正因为此，所以当我审阅完毕小慰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就立即把它推荐给我的博士生阅读，希望他们可

以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

事实上,小慰的书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就是,作者对与其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第一手的外文资料的收集、阅读和梳理相当全面和深入,这也反映出了作者的研究具有相当扎实的文献基础。让我尤为赞赏的是,在我的印象中小慰的翻译研究应该还是比较偏重于语言和功能学派方面的,但本书第一章“西方翻译研究概述”却表明作者的研究视野并未仅仅局限在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或功能学派,而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主要流派、包括文化学派都有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把握,其对各理论流派的理解和评点也都比较准确和深刻,这就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铺垫。

毫无疑问,全书的最大亮点在于作者从新修辞这一独特的角度切入展开其对翻译的研究。说到新修辞,我相信恐怕有不少读者都会和我一样,一开始会望文生义地以为这无非是讨论比喻、隐喻之类的语言表述的修辞手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当代西方语言学家帕尔曼(Chaim Perelman,又译“佩雷尔曼”)所言,新修辞的“核心部分或要点是听众理念,强调根据具体情境因势而动,强调其动态观”,关心的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而本书的研究显然也清晰地体现了这个精神,其追求目标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新修辞理论中精华成果的分析和总结,把它们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从而建立起以受众为中心的翻译“修辞观”研究视野,开辟翻译研究的新思路;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当代新修辞理论的研究,为当代翻译理论话语、现实翻译现象和现实翻译问题提供重新认识、解释和解读的新视角,同时揭示当代修辞观对翻译的解释力。

读完全书,我觉得作者基本实现了她的这两个主要目标。她从新修辞的理论立场出发,指出译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动互惠的修辞关系”,因此“译者和

受众有必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接着作者又强调指出：“翻译合作伙伴的含义在于充分认识翻译受众在翻译行为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他既是被影响、被说服、被服务的对象，同时也能作用翻译行为，影响翻译预期目的的实现。因此，译者不是居高临下，将受众视为被动的接受者，大包大揽，以自认为原文意义已经完美传递为满足，也不是单方面将受众仅仅作为普通的服务对象，一味迎合，百般迁就，只求译文在译语语境中能为受众接受；而是在研究了解受众的基础上，精心设计话语，一方面‘言辞以受众为转移’，另一方面，通过想象和构筑与受众的互动关系，通过‘权威’（authoritative）和‘具有内在说服力’（internally persuasive）的译文话语，不露痕迹地使修辞者（译者）的观点、态度、论辩等获得受众信服和认同，从而促进导致译文话语产生的缺失得到改变，让原作在译语语境中影响译语受众。”不难发现，作者如此从新修辞的理论立场出发，考察、分析译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强调受众的多重角色并特别关注原作在译语语境中的影响，这与只关心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而不及其他的传统翻译理论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与实现了“文化转向”之后的当代译论的精神却甚相契合。

与此同时，作者从新修辞理论立场出发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再认识，以及对当代西方译论，诸如德国诺德等人的“功能目的论”、美国韦努蒂的“异化”论等的重新审视和反思，也应该能引发读者的兴趣。

最后却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本书的“现实关怀”：作者以整整两节的篇幅分别探讨了解决外宣翻译质量问题的突破口和《于丹〈论语〉心得》英译本在海外传播取得成功的原因。在前一节“解决外宣翻译质量问题的突破口”里，作者收集了丰富的外宣翻译例子，通过对这些译例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指出必须培养和加强翻译受众意识，要有效利用象征资源，建立与受众的“认

同”关系。在后一节“《于丹〈论语〉心得》英译本的修辞解读”里，作者指出，《于丹〈论语〉心得》英译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从新修辞理论角度看，一方面是因为译者面对翻译过程中产生的“修辞形势”，在修辞内容和形式上努力做到了顺应形势，因势利导；另一方面，是因为译者利用受众的求知欲和对新知的接受能力，克服了修辞形势对译者施加的限制，根据改善“缺失”的需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为受众提供新的预期，从而使译本获得了受众的认同并取得了成功。正如刘亚猛教授所言：“我国的对外宣传长期以来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虽然我们早已具有将信息传播到西方的技术手段，然而这些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信息，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在多大程度上使西方读者感到可信、在理、有说服力，从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观念，则值得认真反省探讨。对待完全不同的听众/读者应该使用完全不同的说服手段。从面向国内说服对象转向国外，尤其是西方的说服对象，所要求的是一种‘再构思’，‘再表达’，一种‘重构’，而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西方有其历史悠久的雄辩传统、论辩实践、劝说模式。这些传统、实践、模式决定什么样的说法是在理的，如何使用修辞资源才能收到最大效果而又不逾矩，某一种特定场合下劝说对象一般对劝说者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只有增强对这一具有深层规范功能的传统的研究和了解，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在确定外宣方略时流于浮浅或盲目”（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转引自本书“前言”）。小慰的研究不仅对刘教授以上所言是一个进一步具体深入的阐释，同时对我国有关部门如何进一步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甚至对思考中国文化如何有效“走出去”这个大问题，都具有非常实际的启迪意义。

我与小慰教授认识很久了。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次由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和加拿大驻华使馆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我们偶然相遇。因彼此都有访学加拿大的经历，所以一见如

故，谈得很投机，算起来至今都要将近二十年了。虽然那之后我们并没有很多比较密切的直接交往和联系，但我一直注意着她的研究成果，知道她一直致力于翻译研究。小慰的研究给我的感觉是写作规范，学风踏实，所谈问题能切中时弊，而没有时下某些研究者的浮躁。如今又看到她这部即将推出的颇富新意的著述，这标志着她的学术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很为她的学术成就和最新进展感到欣慰，衷心祝愿她能从现在这个新高度继续她的翻译研究，为我国的翻译研究事业和翻译学学科建设作出她的贡献。

是为序。

2012年3月10日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序 二

刘亚猛

小慰历时数载、精心写就的《翻译与修辞新论》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启发良多的新颖视角，使我们得以在当代译学理论的框架内探讨翻译的修辞特征，同时又在当代修辞研究的语境中确认话语与翻译的相互关联。不管是对译学研究领域还是对修辞学界的同仁，本书的出版都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传统中，修辞与翻译曾经长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典修辞发展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欧洲文明的所谓“轴心时期”。致力于继承古希腊文化遗产的古罗马修辞家在将希腊人遗留下来的演说文本及修辞手册译成拉丁语的同时，还进一步对自己所从事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例如，西塞罗发现赋予希腊修辞文本以“拉丁形态”，使译者不但有机会将拉丁语中的“最好表达”派上用场，还能基于对原文措辞的类推创造出罗马人欣然接受的许多新拉丁表达。也就是说，翻译对目标语言总体格调的提升以及对其表达手段的增强、表达能力的扩展都功莫大焉。又如，昆提利安在自身翻译实践的基础上，鲜明地主张译者应该既“效仿”原文又与之进行“斗争”（“a struggle with and emulation of the original”），认为这才是使原意得到转达之道。以西塞罗和昆提利安为代表的罗马修辞家有关翻译的思考涉及到希腊、罗马两种文化、语言的关系，译者对自己的实践应采取的态度、译法及其规范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他们在修辞思想指导下就这些问题进行的探讨标志着翻译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滥

觞亦或古典翻译理论的诞生，为西方翻译思想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管是第4、第5世纪之交在圣杰罗姆的翻译评论中得到完整表述的“意译”（“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范式，还是15、16世纪之交得到伊拉斯谟大力弘扬的直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法，其理论依据无不是当时占支配地位的修辞观念。圣杰罗姆在“承认”其《圣经》翻译采用的是“逐意”而非“逐字”法时，特意声明自己师承了西塞罗的基本观点。而伊拉斯谟本人是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修辞思想家。他在解释为什么对于翻译他宁愿失之拘谨而不愿失之随便时，同样以西塞罗为参照，只不过承认自己是反西塞罗之道而行之而已。有关修辞与翻译在西方学术史上难解难分的关系，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Barbara C. Bowen有过十分精辟的说明。她指出，尽管受过良好教育的当代读者普遍觉得修辞与翻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而言，这两个领域的密切关系却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的：西塞罗和昆提利安是那个时代翻译理论最常引用的权威；当时流行的好几部著名修辞学读本都对翻译有专门的论述；一些关键修辞概念，如模仿、丰裕、劲道、生动等，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理论的关键概念。¹

Bowen的评述在肯定了两个领域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同时，也使我们不禁对它们何以在近代渐行渐远最终形同陌路感到好奇。的确，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一般译者及译作的读者由翻译而联想到修辞的几率很小，就连专门从事翻译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鲜有将修辞当一回事的。即便译学早已被发展为方法多元的一个跨

1 见Bowen, Barbara C. Review of *The Ideology and Language of Translation in Renaissance France and Their Humanist Antecedents*. *Rhetorica*, 1985, 3(2): 150-153.

学科研究领域，对语言学、交流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文学/文化研究所提供的理论资源可谓兼收并蓄，还将目光转向了修辞有传统研究优势的不少方向，如翻译的功能目的、译者与读者的互动、读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影响翻译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包括文化地位及权力关系的差别）等等，但是修辞在译学界受到冷落与翻译不再为修辞学界所看重一样，仍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即便我们仅考虑这两门学科的历史渊源以及古典修辞家对翻译实践的洞察为后世进一步思考这两种实践指明的方向，这无疑都是一个理应予以改变的事实。更何况正如小慰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将这两门学科的当代理论视角交叉应用于彼此的研究目标有望产生可观的认知及实践“红利”。小慰敏锐地意识到上述缺憾及机会的存在，并通过本书的出版力求对这一修辞形势进行有效干预。

她的研究植根于对译学和修辞学比较全面的把握，尤其是对这两门学科共有但又各具特色的跨学科特征的准确定位。她为修辞和翻译确定的七个契合点指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促成某种相辅相成的融合互动的充要条件。在书中，小慰将原作者和译者作为修辞者看待，从把握原作修辞动机、译入语受众面临的修辞形势、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修辞目的对语境进行的重构等角度，重新审视了翻译的整个过程。她还以修辞的名义与“功能目的论”、“异化翻译论”等当代译学重要理论进行了新意迭出的对话。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小慰强调了修辞研究所具有的突出实用性，将修辞视角的引介与我国翻译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指出提高译者的修辞意识是改进我国外宣翻译质量的关键环节。

所有这一切都为修辞在译学研究理论层面上的进一步介入、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富有开拓意义的尝试和贡献。《翻译与修辞新

论》一书无论是对译学研究疆域的开拓，对当代修辞学应用范围的扩展，还是对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探索，都具有示范意义。在这部饱含艰辛的著作付梓之际，我向小慰表达由衷的敬意与祝贺。

2012年3月31日

前言

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语言学转向”开始，翻译研究经历了解构传统、突出译文目的、注重交际语用、从规定到描写、文化—社会学延伸、强调译者主体性等大大小小的“转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被称为“U形转向”的提倡语言学研究方法复兴之风又悄然兴起。但是，这一翻译研究向语言学的回归并非回到原点，而是从多维度的视角对翻译本体进行分析，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进行阐述，从而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分析近年来围绕翻译本体的讨论，我们已经有了语言、文化、功能、规范等切入点，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一些基本但却至关重要的方面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例如译文受众偏离研究中心，对构成译文的要素——译文语言的象征力量缺乏关注等。在对宏观的、外部的因素倾注了太多关注的今天，更突显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从这一点出发，本专著尝试引入从古典修辞学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修辞理论“新修辞”（New Rhetoric）。这是一门强调言辞以受众为中心、注重修辞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重视话语象征力量、关注如何有效运用象征资源影响受众的综合性语言理论，突出修辞既是一种认知方法，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观点。

在多元文化的当今社会中，通过话语形式，改善相互隔离的人与人之间寻求有效和解的手段，是修辞的根本任务。翻译作为面对人、作用人、影响人的跨语言、跨文化活动，我们有必要将

其视为一个修辞行为。而从修辞的视角看，翻译面对的既不是原语文本，也不是译语文本，甚至不是单纯的译文功能，而是人，作为现实世界受众的人。这些人必须靠作为修辞者的译者有效运用象征资源，使其对译文话语产生认同，进而信服，并最终达到说服影响其改变态度或采取行动的目的。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

围绕这一中心，通过书中各章的讨论、分析和论述，本书试图说明，翻译研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蓬勃发展，从语言到语用，从交际到文化，从文化到社会，从文本到功能，翻译学者们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又不断引发我们的批判性思考，督促我们不断对其加以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和拓展。但对构成翻译文本主体的话语本身、对译者与受众的关系、对如何运用译语话语有效影响译语受众等方面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足够的分析。而强调言辞以受众为中心、注重话语修辞力量、注重精心构筑话语以有效影响受众的新修辞，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提高这方面的认识。

德国著名哲学家和阐释学家加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把修辞称为 *techné*（希腊语：技术），而是 *dunamis*（希腊语：力量），因为它本质上属于人作为理性生物的一般定义。¹ 而 *dunamis* 一词在英语里有 *power*, *capability*, *strength*, *force* 之意，是 *dynamic*（“活力”、“动感”）的词源。加达默尔的这一解读深刻揭示了修辞本质和象征之力。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中对“修辞”的探讨大都基于修辞等于修辞格或美文这样一种“前理解”、“前理论”或“传统”观念。翻译中围绕修辞的研究探讨基本处于对修辞的静态研究，其关注点主要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修辞格的处理上，视野狭窄，忽视了话

1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9, pp. 568-569.

语修辞的动态性，偏离了修辞的核心要点。这一点因为受中文语境中对修辞定义主导性传统认识的制约，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当代翻译理论和修辞理论的发展呼唤着对传统“翻译—修辞”观的重新认识、更新和扬弃，促使学术界对翻译与修辞关系的传统观念加以重新认识。本书通过对这一关系的审视、思考和论证试图表明，修辞是认识翻译活动的一种视角和精心选择话语的步骤和行为。它对翻译研究具有的认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在于，修辞意识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翻译“修辞观”。在其独特的视域内，我们将得以深化对翻译如何影响受众的认识，充分发掘译文话语的修辞力量，主动探索对翻译活动及其参加者的新的认知角度，更为有效地利用言语资源，从而进一步丰富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总之，翻译在经历了语言的、文化的、社会的、功能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力的等不同视角的关注后，我们有必要在修辞的层面对其予以理论和实践上的关注。可以说当代修辞理论对翻译研究的作用就好比找到了翻译研究中一根缺失的链（missing link），使翻译描写更加全面、清晰。

在当代语境中，翻译和修辞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之间最大的契合点是它们都是以运用语言象征为主、面向受众的交际活动。两者都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最基本的共同特性都是交际。两者在目的性、交际性、语言性、受众性、语境性、现实性、跨学科性等几个方面都存在共识。本书以此为基础，通过列举分析现有主要翻译定义，尝试从现实出发，突出译语受众和语言象征这两个关键要素，对翻译活动重新定义；同时运用“戏剧五元模式”，对翻译参加者重新审视，思考译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提出译者（修辞者）与读者（受众）的关系不是独立而互不相关的，而是合作、转换并相互依存的。翻译活动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传统对翻译过程的描述是“理解—

再现”，而从新修辞角度认识，翻译的过程是把握原作修辞动机，进行语境重构的过程。译者要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以实现译文的修辞动机为出发点，帮助受众克服局限，在译语语境中对原作内容和语言进行“再表述”（represent），让原语文本能够在译语语境中有效影响受众，诱导其产生预期的认识、判断和行为。

当代修辞既是认识翻译活动的一种视角，也是一种翻译方法。除了从“新修辞”框架内对翻译进行理论再思考外，本书尝试在“新修辞”框架内审视翻译实践活动。首先从语言的象征力量入手，围绕译文话语对事实与情感的不同呈现，运用真实案例分析译文话语对现实生活的正反两面影响，提出“带着修辞意识”进行翻译实践的必要性。其原则为：以译语受众为中心，建立认同，根据受众需求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必要的调适；用受众熟悉的方式有效说服、诱导，使受众至少在愿意倾听的基础上，信奉、认同译者欲加以影响的内容。译者需有效运用论辩内容、诉求策略、话语建构方式和美学手段等象征资源，确保译文话语让受众感到言之有理，令人信服；运用得体的诉求策略，满足受众预期，激发受众情感；通过精心设计行文组篇，用熟悉的语篇形式打动受众；同时恰当运用美学手段，使语言表达在译语语境中更加独特、优美、富有说服力。

本书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出发，重新认识、解释和解读一些当代翻译理论话语和现实翻译问题，揭示当代修辞观对翻译不同于传统的解释力。围绕近年来翻译研究学者们投以大量关注的德国翻译“功能目的论”和韦努蒂的“异化”理论话语，本书从修辞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分析，提出新的认识。外宣翻译质量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翻译界、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本书指出其主要原因是受众意识缺乏，对汉英修辞差异缺少了解，同时对译文象征话语的巨大力量关注不够，提出从修辞视角切入或许是解决此类问题突破口的观点。作者认为，要提高外宣翻译质

量，需切实加强译者受众意识的教育，培养修辞对比意识，重视译文话语的修辞力量。修辞模式的不同反映的不是认知能力的差异，而是认知视角和认知方式的差异。因此，简单地把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并不能保证译文就能够有效影响受众。要想满足另一种文化的修辞预期，需要我们把关注点超越语言本身。译语受众的文化和修辞预期需要译者重组信息，避免歧义，构建适当的修辞氛围，帮助受众正确了解信息，受到有效影响，实现翻译的修辞目的。在维护民族语言文化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要注意求同存异，对它国文化予以应有的尊重。用西方人熟悉的方式宣传中国文化，达到通过翻译在受众心目中树立我国正面形象的预期目的。

美国当代修辞学家罗埃德·比彻（Lloyd F. Bitzer）的“修辞形势”（The Rhetorical Situation）理论，其基本观点为修辞植根于特定形势并随“势”而动，作为各种微观具体的修辞案例分析模式，十分具有启发意义。本书尝试应用该理论，对缺失、受众和修辞局限以及译者采取的因应之策等方面对备受关注、在海外获得巨大成功的《于丹〈论语〉心得》（*Confucius from the Heart*, 2009）英译本进行解读分析，揭示其巧用西方人熟悉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的启发意义。

正如根茨勒所建议的，翻译研究可以不断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其他学科一样也可以从翻译研究中获得借鉴。¹ 本书的观点不是要否定前人的理论成果，更不是要替代，而是旨在补充、推进、促进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

而本书对修辞研究而言，也具有价值和意义。翻译与修辞的跨学科研究使修辞研究对象和适用范围扩大到不同语言和文化之

1 Edwin Gentzler. *Interdisciplinary Connection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视角：翻译学研究》，第二卷，Cay Dollerup 主编，中文版主编 王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 19.